



高校学术文库

中国近代
新人学说的
价值研究

隋淑芬 著



中国近代新人学说的价值研究

隋淑芬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新人学说的价值研究/隋淑芬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656 - 0354 - 9

I. ①中… II. ①隋… III. ①改革—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①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4177 号

ZHONGGUO JINDAI XINREN XUESHUO DE JIAZHI YANJIU

中国近代新人学说的价值研究

隋淑芬 著

责任编辑 张宏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31 千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 言

中国近代维新派思想家在近代思想发展史和启蒙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们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中一个较特殊的群体，大都是集理论大家、政治家、教育家于一身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的思想建树不仅在当时影响极大，而且他们所确立的以人的自由为核心的启蒙主题、主体与客体现代化的视角、进化论的思维范式等，对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思想发展和思想走向都产生了深刻、复杂的影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培育了后来的诸多思想家。因此本书主要以维新派思想家为研究对象来阐释中国近代的“新人”学说。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转折点，这一事件成为维新派思想家思想跃升的重要契机，他们由反思战争失败到反思洋务运动的失败，由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转向思考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即变革社会政治制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变法思潮，使中国近代的救亡图存与启蒙寻找到了一个契合点，救亡这一社会课题为启蒙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建构了启蒙思想发展的平台，启蒙为救亡图存提供了基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知基础上的正确道路和基本模式。

在社会制度变革问题上，正是维新派思想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民主制度的现代性与普适性问题，他们从外在的制度形制和内在的制度理念两方面来阐释这一问题，使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思路，不是简单地照搬和模仿西方，而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视域思考近代民主制度理念的合理性，使自己变革制度的思路具有独立的理性思维基础，这样，在近代的启蒙语境中，以人的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制度理念，使维新派思想家开始从形而上的层面重新思考“人”，批判和超

越了中国传统的人性模式，尝试着创建一种近代形态的人学体系——“新人”学说。

第一，近代的“新人”学说运用新的解释范式和话语，在人的生命层面、个体层面、群体层面、关系层面、历史层面等，理解和阐释人，构成了近代“新人”学说的基本逻辑体系。这一人学学说的问题域对其后社会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维新派思想家的新生命理念作为新人学说的基础理念，全面阐释了近代历史背景下生命的生存危机、生命的目的性、生命向本质回归、生命价值的依据、重构生命的价值意义、生命尊严意识、生命关系、生命异化等一系列问题，是中国近代思想中重要的理论建树，同时，其生命理念的缺失也造成了启蒙思想的重要缺陷。

第二，人作为可以建构的存在物，是现实的人对自己本质的占有或人性的实现，即“做新民”。“新人”与“新民”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和视域，学术界对维新派思想家的新民思想关注较多，“新民”思想主要着眼于国民素质问题，而“新人”学说是在近代启蒙语境中人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建构和设计，是在哲学层面探讨人的存在、本质和历史发展，它超越和涵盖了新民思想。立足于这一视角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维新派思想家新民学说的价值。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的层面，维新派思想家开启了近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他们对国民性进行了痛彻的全面反思，其内容包括国民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思维素质、知识素质、心理素质、人格特征等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多方面探寻了国民素质低下的原因，涉及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的问题，使这一反思形成了以国民性批判为中心的社会批判思潮。

第三，维新派思想家对社会制度与新人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制度思维的视角阐释新人与新制度的互动共生关系：新制度生成新人；新人引发社会的新制度需求；新人与新制度互为前提，良性互动。这种思考，既注重理论性，又注重现实

操作性，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现实的困境，使维新派思想家在理论上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并对他们其后的思想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现了所谓近代思想家的“后期思想特征”现象，即他们的前后期思想出现巨大反差及矛盾，这一问题也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长期讨论且分歧颇大的问题。

第四，中国近代人学理念的缺失及其内蕴的诸多矛盾，在深层次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建构，造成了启蒙思想的诸多缺陷，甚至使启蒙思想偏离其本质，同时也造成了一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多变与思想蜕变，使中国近代的启蒙陷入困境，从人学理念的视角解读这一历史现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其思想蜕变的内在逻辑。

可以说，中国近代的“新人”学说建构了一种新形态的社会价值体系，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对解构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对推动中国社会思想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掘其思想价值、解析其思想困境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建构启蒙的人学理论：新人学说的提出	(1)
一、现代化视域：由客体现代化到主体现代化	(2)
二、进化论视域：建构社会进化的人学尺度	(5)
三、启蒙视域：建构人学体系	(8)
第二章 新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人学范式	(10)
一、建构新的人性模式	(10)
(一) 人是“求乐”“自利”的感性存在	(12)
(二) 人是基于“自有主权”的自主性存在	(14)
(三) 重新诠释人的群体性	(17)
二、新人——新民——新制度	(22)
三、“新人”思想的价值	(26)
第三章 新生命理念	(30)
一、生命存在论	(30)
二、生命权力论	(36)
三、生命价值论	(40)
四、生命关系论	(41)
第四章 人权视域中的女权思想	(49)
一、女权的合理性	(49)
(一) 以天赋人权说论证女权的天然合理性	(50)
(二) 以近代人道主义伦理原则论证女权的道德合理性	(52)
(三) 以社会文明进化论证女权的历史合理性	(55)

(四) 以女权的社会价值论证其价值合理性	(57)
二、启蒙语境中对女性基本权利的认知	(57)
(一) 生命权	(58)
(二) 身体权	(59)
(三) 婚恋自主权	(61)
(四) 男女平等权	(63)
(五) 受教育权	(65)
第五章 社会进化的辩证思维	(70)
一、内因与外缘	(70)
二、变一与变万	(77)
三、古今新旧	(81)
四、迅变与渐变	(85)
五、共性与个性	(88)
六、自然与人为	(89)
七、国家与个人	(91)
第六章 社会进化的主体基础	(96)
一、新民是救亡与富强之本	(96)
二、新民是近代民主制度的基础	(102)
三、国民历史观的转型	(107)
(一) 建立新的社会历史起源论	(108)
(二) 从世界历史的视域认知历史规律	(111)
(三) 运用新方法认知历史规律	(114)
第七章 新人的生成路径	(122)
一、民主制度生成新民德	(122)
(一) 民主制度为新民德提供生成和发育的空间	(124)
(二) 制度收益：民德转型的内驱力	(131)
(三) 新制度建构国民整体道德理性和道德主体性	(138)
二、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重构价值理念	(142)

三、教育塑造国民的新人格	(151)
(一) 国民教育价值论	(151)
(二) 改革教育制度	(163)
四、开展国民运动	(175)
第八章 国民性反思	(182)
一、国民劣根性	(182)
(一) 奴性	(182)
(二) 依附性	(185)
(三) 自私	(186)
(四) 好伪	(188)
(五) 愚昧	(189)
(六) 懦弱	(191)
(七) 无耻	(191)
(八) 保守封闭	(192)
(九) 幼稚性	(193)
(十) 思维方式的缺陷	(195)
二、国民劣根性的根源	(197)
(一) 社会制度根源	(197)
(二) 治国理念	(200)
(三) 政术	(201)
(四) 生计	(203)
(五) 人口和社会地理环境	(204)
第九章 启蒙的文化课题	(207)
一、中西文化比较	(207)
(一)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法	(208)
(二) 中西文化比较的价值定位	(211)
(三) 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	(216)
二、近代的文化综合	(219)
三、文化综合的困境——主体心态	(230)
四、文化综合的基础薄弱	(233)

第十章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中人学理念的缺失	(240)
一、进化论对中国近代人学理念的消解	(240)
(一) 存在意识的缺陷	(241)
(二) 人与人权的疏离	(249)
(三) 启蒙价值诉求的制度思维路向	(261)
二、近代生命理念的缺失	(264)
(一) 生命是权力存在体理念的缺失	(265)
(二) 生命同质性理念的缺陷	(270)
主要参考书目	(272)
后记	(275)

第一章 建构启蒙的人学理论： 新人学说的提出

启蒙是近代以来兴起的人文思潮，它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核心理念，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思想体系，系统地彰显出现代性的特征。但是，在世界各个国家的近代史上，启蒙思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同样是自由、民主、人权等话语，但是其所包含的意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甚至较大的差异，这种情况的形成，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深受当时各国的现实状况所影响。

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首先，1840年之后，近代的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蚕食和瓜分的民族危机，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使亡国灭种迫在眉睫，康有为深切地意识到这场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①“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②梁启超认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③寻求民族救亡之路，成为当时有识之士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也是启蒙思想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的中心地位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149页。

② 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149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81页。

ZHONGGUO JINDAI XINREN XUESHUO DE JIAZHI YANJIU

中国近代新人学说的价值

研究

和紧迫性，影响到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一些重要启蒙思想理念的理解和解释。

其次，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是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从西方输入的，对于这种外来的思想理念，如何解读和理解，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一外来思想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冲突，寻求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启蒙思想的阐释方式或表达形式，这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对近代启蒙思想家理解和解释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构启蒙思想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决定了近代启蒙思想家思想发展和思想蜕变的轨迹。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回应时代所提出的历史课题，探索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之路，催生了一个精英群体——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核心的维新派，维新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启蒙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首先，他们本人不仅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学养，其中一些人又对西方思想具有系统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对西方启蒙思想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因此力图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融合中西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尽管这些思想体系存在着各种缺陷和不足。其次，他们是集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于一身的精英人物，这使他们在思考各种社会问题时，具有宽阔的视野，形成了多角度的综合思维的思路。

启蒙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学学说，或者说人学学说架构了启蒙思想的基本体系和核心内涵，维新派新人学说的提出，奠定了中国启蒙思想的基本架构，对其后启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现代化视域：由客体现代化到主体现代化

1840年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正如罗荣

渠所讲：“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①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后现代化的国家，它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带有救亡图存的被动性，同时，在了解和接触世界先进国家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效仿和学习西方，又带有主动的性质，这种被动性和主动性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过程充满了曲折，也使得近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时，具有了不同的思考层面和思考视角，促使他们能够不断地总结和反思，调整自己的思路，尽管这一过程，有的是思想家自身思路的转变，而有的则是通过不同思想家群体的思路交锋或切换实现的。

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这一运动是由上层政治人物发动和主导的，加之未触动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又迫于当时救亡的紧急情势，人们在工具理性的层面认同这一运动，使得这一运动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展开。洋务运动的意义在于，第一，它使近代中国在器物层面大规模地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现实，并且使人们在这一层面接受了西方文化，“讲制造也，则曰必精算学；讲交涉也，则曰必通语言；办教案也，则曰必谙外交；言通商也，则曰必达商情。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物，而一概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17页。

之以一名词焉，曰‘洋务’。”^①从而开启了中国客体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就无法遏制，它必然会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尽管这不是洋务派的初衷。第二，洋务运动在吸收和推广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受到西方科技所内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影响。第三，洋务运动以其大规模的实践，为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不但洋务运动救亡和强国的目的没有实现，其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这就引发了对洋务运动的反思，这一反思，在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构成了一个辩证否定的环节，即对洋务运动的反思是一种扬弃。这一反思的主体是维新派思想家。

首先，维新派思想家对洋务派客体现代化的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因此其思考的方向不是否定洋务派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做法，而是思考这一做法的不足，思考如何使学习西方科技更进一步深化到其他层面，这样，才能使这一反思立足于洋务运动已取得的成果，以此为基础实现发展和飞跃。

其次，维新派思想家对洋务运动的宗旨进行批判性思考，主要是颠覆洋务运动所遵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思路，洋务运动把西方的先进归结为科学技术，严复指出，西方的科学技术仅仅是其外在的表现，洋务运动正是执著于学习其外在的事物，而缺乏与之一致的内在理念，这一内在理念就是自由，“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②严复把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归因于以自由为核心的民主制度。

在反思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维新派思想家鲜明地提出了变革政治制度的主张，这样，对客体现代化的思考由科技层面深

①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741页。

②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

化到社会制度层面。这一思路的转变，在实践上推动了戊戌变法的展开。在思考和设计社会根本制度变革的同时，维新派思想家探讨了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确立民主制度的基本理念，即对人的合理生存和存在状态的认知，使制度设计符合人性。二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他们从变革基础的角度，思考洋务运动的失败，这一思考便深入到国民素质问题，“盖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壤。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桔成枳。”^①这样，中国近代思想家对现代化的思考，由客体现代化转向主体现代化，并且将二者结合起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对主体现代化的系统思考，使维新派较全面地探讨了人学的一系列问题，系统地建构起其新人学说。

二、进化论视域：建构社会进化的人学尺度

1898年，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正式出版，这部译文与按语相得益彰的译介本，随即风行于世，深刻地影响着几代人的思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②数十年间，进化论的相关词语，如“天演”、“天择”、“进化”、“进步”、“物竞”、“竞争”、“适存”、“优胜”、“劣汰”、“自强”、“自立”等等，成为社会最流行的口头禅，以至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进化论成为一种强势话语。西方的进化论不仅解释了中国亡国灭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且提供了救亡图存的理论和路径，因此进化论从思维内容到思维方式两个方面，都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走向和发展历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深刻影响。

^① 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339—1340页。

^② 汉民（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146页。

ZHONGGUO JINDAI XINREN XUESHUO DE JIAZHI YANJIU

中国近代新人学说的价值

研

究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学说中，不乏进化理念，这种进化理念与人的群体性观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确立了一种观察和解释社会进化的视角。这种进化理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类由“散”入“群”，这是人类进化最重要的标志，基于此，如何保持群体的稳定性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对群体稳定性的理解又往往集中于保持现有的社会秩序，这种理念对于维护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二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进行创新和调整，如在封建社会建立时期和前期发展阶段的体制创新，在封建社会后期应对危机的一些改革，这些变革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巩固封建社会制度、稳定社会秩序和优化现有的社会结构是其宗旨。三是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制度变革时期，为论证变革合理性所提出的进化论，如儒家带有温和变革色彩的“损益论”，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①法家带有激进色彩的进化论，如：商鞅将历史进化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世，“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他以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论证“世事变而行道异也”^②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思想，他也将历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三世之间有明显的进化标志，“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渚。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渚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

① 《论语·为政》，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1—22页。

② 《商君书·开塞》，高亨：《商君书译注》，中华书局，1974年，第74页。

论世之事，因为之备。”^①所以结论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②这一进化论为法家的社会变革建立了历史观的依据，其旨在论证封建制度的合趋势性与合规律性。

传统进化论的最大缺陷是设定了一个既定的目标模式，进化论是为了论证这一目标的合理性，而这一目标模式本身是不可触动的，这就是以封建伦理为核心价值的等级制，当宋明理学将封建伦理上升为“天理”时，使这一目标价值具有了终极意义，并且获得了囊括天、地、人的世界发展规律的理论支持，在“所以然之理”和“所当然之则”两个层面上互相论证，可以说，这一目标及其理论架构，是传统进化论不可逾越、也无法逾越的界限，因此传统进化论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限制了进化论理论的适用范围，也规定了传统进化论的理论不彻底性的品格，这种局限使得这一理论无法成为近代启蒙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基础理论，因此超越传统的进化理念是近代启蒙思想家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西方的进化理论使维新派突破了传统进化论的局限，在进化论的框架下，维新派重新诠释人的群体性，在生存论的意义上，严复提出“善群”，“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③旧的封建专制体制和社会结构中的群体性，是一种违背进化之势的落后的群体结构，康有为对这种进化之势作了清晰的阐述：“欧洲自十七世纪后，君权大张，自十八九世纪时，民权大盛，自卢骚民约之说出，法国革命之事生，波荡诸欧，披靡全球，在理为公理，在势为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火烈

① 《韩非子·五蠹》，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40页。

② 《韩非子·五蠹》，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42页。

③ 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347页。